

# 毛主席的好儿子

## ——毛岸英烈士传略(二)

湖南省图书馆  
长沙市图书馆 《毛岸英传略》编写组

### 三、流浪上海街头

岸英出狱回到板仓几个月后，在党的关怀下，毛泽民同志从上海写信并寄钱给杨老夫人，请他老人家设法把岸英兄弟秘密送往上海，以防再遭敌人的毒手。一九三一年春节前夕，六十高龄的杨老夫人不顾长途跋涉，冒着风险，和岸英的舅妈把岸英、岸青、岸龙送往上海。

一路上，为了安全，岸英兄弟按照大人的嘱咐，叫外婆做奶奶，叫舅妈做妈妈。旅途中，外婆和舅妈想到开慧同志的牺牲，每听他们兄弟叫一声奶奶、妈妈，都心如刀绞，悲痛异常。

到了上海，经过党的地下联络点的联系，岸英兄弟和叔叔毛泽民同志在一家旅馆里会面了。泽民同志含着眼泪，抚摸着岸英兄弟的头，沉痛地说：“干革命总是要死人的！”随后，把岸英三兄弟安排在互济会办的大同幼稚园里。这所幼稚园是党领导下的一个单位，岸英兄弟在这里过了一段比较安定的生活。老师对他们好，他和岸青学习也好。只是三岁多的小弟弟岸龙晚上有时尿床，岸英经常半夜起来给弟弟换尿片，盖被子。这时他已能写信了，曾把这些情况写信告诉外婆。外婆看了信，想到岸英才九岁，就要代替妈妈来照顾小弟弟，不禁心酸泪下。

过了几个月，由于叛徒的告密，上海的

党组织遭到严重的威胁。毛泽民同志等奉命撤往中央苏区。临行前，泽民同志和杨老夫人约定秘密地到幼稚园附近的一个公园里看望了岸英兄弟，鼓励他们好好学习，但又不好告诉他们自己即将离开上海的消息，心里非常难过。这次会面后，杨老夫人被迫很快到南京去了。岸英兄弟三个这时一个九岁、一个八岁、一个四岁，过着远离家乡和亲人的生活。不久，由于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幼稚园也被迫停办。最小的岸龙，在颠沛流离中失去了下落。岸英、岸青被匆忙地安置在一个牧师家里。

开初，党组织曾给这个牧师家里一笔费用，岸英、岸青的生活还算过得去。但是，却失去了进学校的机会。然而，恶劣的环境并没能磨灭岸英强烈的学习愿望。他想尽一切办法顽强地学习。这个牧师有个儿子经常要岸英陪他下象棋，岸英就和他约定：每赢他一盘棋就得教岸英认三个难字。后来，岸英嫌这样认字太慢，他看到人家读书时遇到不认识的字便查字典，就下决心买一本字典来自学。他做了一个计划，每天把牧师老婆给他买早点吃的两个铜板节存下来去买字典。两个月的时间过去了，积存下来的钱还不够买一本字典所需要的钱的一半。每天早上饿着肚子去做事也实在难以支持。一天，岸青看到哥哥不吃早饭，便追问他的原故，岸英把自己的计划告诉了岸青，希望岸青也每天

能节省一个铜板。岸青欣然同意了哥哥的要求，但岸青喜欢讲故事，便向哥哥提出一个条件：每天他给岸英一个铜板，岸英要听他讲一个故事。岸英自然允诺。又过了两个多月，终于积够了八角大洋，买了一本学生小字典。岸英这时是多么高兴啊！他把这本字典一直随身珍藏，随时翻阅，利用它帮助自己学习。后来还带出国外，回国时又带了回来。

在牧师家里呆了不太长的时间，由于地下党组织遭受到更为严重的破坏，关系断绝了。岸英兄弟的处境更为困难，后来，竟流落在上海街头。解放以后，岸英在回忆这一段生活时说：我们第一天的流浪生活是这样度过的，这一天，我们在大街小巷捡烟蒂卖钱，搞了一天，结果吃不上一餐饭。于是我们住在破庙里，在外面“找生活”。有时捡破烂，有时在白渡桥上帮人推人力车过桥。后来看到许多小朋友卖报、卖油条，我们觉得这是谋生的好办法，便去向一个小朋友打听。卖报、卖油条需要本钱，没有钱是不行的。那个小朋友非常同情我们，他要我们一同到他家里去，看他爸爸是否能作保，先卖货，后付款。我们去了，他家里也很穷，老人对我们很同情，答应我们的要求，并带我们到卖报、卖油条的老板那里，写了保条，保证我们兄弟二人先取货后付款，如当晚不来付款，便由他负责偿还。我们在贩卖中遇到很多困难。一次，流氓阿飞横蛮地夺取我们的东西，岸青交不上款，挨了老板的打骂。他一边走，一边哭，一边骂：“他们打我们，我们长大了也要打他们”。走到一根电线杆旁，他看到地上有点粉笔，就拾起来在电线杆上写下：“打倒帝国主义！”这时被一个巡捕发现了，那家伙使用警棍向岸青身上、脸上乱打，这还不算，又从小贩手中抢过铁夹钳向岸青头上猛击。岸青被打得头破血流，昏倒在地上。后来，我只好和别人扶他到

破庙里睡着。这时，有个好心人帮着找了些草药涂上，他才渐渐好转。解放初期，岸英在和亲友谈话中感叹地说：上海五年流浪生活，真是不堪回忆啊！在一次看电影《三毛流浪记》时说：“我小时候在上海的流浪生活就好像三毛一样，所不同的只是我没偷过东西，没当过人家的干儿子！”在那黑幕笼罩的上海滩上，岸英兄弟当时的处境和生活条件，真是艰苦到难以使人相信的程度。他们在苦难的深渊中顽强地生活着，奋斗着，整整度过了五个年头！在这苦难的日子里，岸英回想起父亲的亲切教诲和母亲为革命英勇献身的情景，身上就增添了无穷的力量。就是这种力量支持着他战胜了艰难困苦。这段生活使他对万恶的旧社会有了深刻的认识和强烈的憎恨。

一九三五年十月，毛主席、党中央率领红军经过坚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到达了陕北。一九三六年，党中央指示上海地下党组织寻找岸英兄弟。经过一翻周折，岸英兄弟终于被找到了。这时他们已是衣衫褴褛、面目黧黑、瘦骨嶙峋的了。随后，按照党中央的指示，上海地下党把岸英兄弟送往苏联学习。

#### 四、战斗在远离祖国的地方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根据地下党的安排，岸英、岸青跟着“抗联”的一位爱国将领，从上海启程，坐海轮来到法国。为了等候办理到苏联的入境签证，岸英兄弟在巴黎住了两三个月，初步学会了一些法语。在那灾难深重的年代里，中国人在国外遭受着歧视和欺凌。在巴黎，岸英兄弟都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有一次，岸英和岸青漫步街头，几个法国人见他们气宇轩昂，衣饰整洁，连声叫道：“日本人，日本人！”岸英听后，气极了，急步上前，喊道：“我们是中国人！”使得那几个法国人惊奇不已。在巴黎他们住的旅馆

里，旅馆老板有三个儿子，见岸英兄弟是中国人，开头老欺侮他们。有一次，那三个小孩在院子里碰见了岸英兄弟，就捡起梧桐子打他们。富于反抗精神的岸英再也忍受不住，对岸青说：“不要怕，他们拳来，我们脚去。打！”顺手抓着一把藤椅当盾牌，一手捡起梧桐子狠狠地回击过去。那三个小孩被打得落花流水，以后再也不敢挑衅了。

一九三七年初，岸英和岸青来到了苏联。他们化名为杨永福、杨永寿，住进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的宿舍里。

一九三七年春到一九三八年冬，岸英在莫斯科市郊的贡彻沃学习俄语。一九三八年底搬到莫斯科市郊的莫尼诺共产国际第二儿童院继续学习。一九三九年暑假后，岸英开始在儿童院附近上苏联十年制学校的六年级（相当于我国的初中一年级）。一九四〇年秋，他又搬到依万诺沃市共产国际第一儿童院。在这里，他加入了苏联共产主义青年团。在依万诺沃市，他到第一儿童院附近的罗细诺——彼得罗夫斯基中学继续读书。

岸英从小就酷爱学习，在那风雨如磐的上海，岸英渡过了五年多的艰难岁月，失去了进学校的机会。现在，党组织把他送到了苏联，斯大林同志领导下的苏联党和政府，给他和其他中国儿童安排了良好的学习条件。岸英充分利用这些条件，发奋读书。在学校里，岸英始终遵守纪律，刻苦钻研，每期期末考试都获得优异成绩。他俄语讲得很流利，还能用俄文写文章。后来，他又学会了英语、德语、法语，中文水平也有提高。但是，岸英并不满足于课堂上所获得的知识，课余时间他努力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及其他政治书刊。他通读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其中许多章节他都能背诵。他想方设法要到了延安出版的毛主席著作单行本，利用课余时间认真学习。一九四〇年夏，每天午睡时间，其他同学都休息了，岸

英却躺在床上津津有味地读着一本油印本小册子。时间久了，引起了他的好友蔡博的好奇。一天，蔡博同志抢过他的书一看，才知道他是在读毛主席在延安中央党校讲课的关于《唯物辩证法》第三章的讲义。这本小册子，被岸英用一张《少先真理报》精心包好，书扉页上还题着《唯物辩证法 毛泽东著 永福题》的字样。在文章的一些重要章节、段落上，岸英用铅笔划上圈圈、杠杠，写上了眉批和问号。这本书，至今被他的一位老师珍藏了下来。在儿童院，他还和几个中国孩子自动地组织起来研究中国历史。他们有计划地读书，互相交流读书心得。他们的这一行动引起了一些人的非议，有人在墙报上写文章责难他们。岸英毫不犹豫地组织反驳，他自己写了三十多页长的文章，详尽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在他的带领下，其他孩子也纷纷写出了文章，贴在一块木板上公布出去，把那些非议给顶了回去。一九四二年初在依万诺沃时，岸英利用寒假期间在儿童院党支部书记的帮助下，花了约半个月的时间阅读了苏共历次党代会的决议和文件，比较熟悉了列宁和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共产党的历史，丰富了他的历史知识。

一九四〇年，敬爱的周总理因手臂摔伤去莫斯科治疗，当他知道有中国孩子在苏联学习时，非常兴奋，立即用左手写了一封信给儿童院的孩子们。手臂治好，总理和邓大姐一起来到儿童院，非常亲切地与岸英等孩子握了手，还单独与岸英兄弟照了相，和蔼地询问岸英兄弟：功课好不好？长大了想干什么？勉励他们要好好学习，将来回国，好为人民服务。

岸英身居苏联，胸怀祖国。他非常关心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战局的发展。每天他都注意收听广播，阅读报纸，经常把有关国内抗战的消息记载下来，进行研究。苏联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也寄予很大的同情，

许多单位邀请岸英去作报告。岸英满腔热情地向苏联人民宣传中国人民在毛主席和共产党领导下的神圣的抗日战争，以增进中苏两国人民的战斗友谊。他曾在一九四〇年四月写信给延安的《新中华报》，向祖国人民介绍这些情况。在信的最后，岸英这样写道：“我现在在俄国的学校里学习。我要百倍的努力来完成我的学习。我很注重于政治和军事，并且愿意成为一个政治家、军事家，成为一个很好的宣传家，以便将来为伟大的新中国的事业而斗争。我坚决相信，在抗战胜利以后，中国一定会被建设成一个先进的、自由的、幸福的强国。在那个时候，中国的人民将享受自由与平等的生活，中国的儿童将得到免费学习的权利，将不再过着那种贫困的生活。那时啊！中国是伟大的、强大的、民主的中国了！”字里行间充满了无产阶级的爱国主义激情。

在依万诺沃市第一国际儿童院里，有二十七个国家和民族的共产党领导人和革命烈士的子女在一起学习。岸英来到这里后，很快就和大家相处得很好。他经常和大家说：“我们都是兄弟姐妹，我们在这儿就是一个大家庭。”他性格开朗，朝气蓬勃，待人友好，谦虚热忱。他积极参加体育锻炼，特别爱好排球，冬天常和同学们一道滑雪、溜冰。他的国际象棋下得很出色，是儿童院的国际象棋冠军。对于各种社会活动他积极参加，在同学中有很高的威信，曾被选为儿童院的团支部书记和共青团依万诺沃市列宁区区委委员。在这样的环境里，培养了岸英强烈的国际主义精神。当希特勒进攻法国时，岸英和他的伙伴找来一份法国地图，每天把战局进展的情况用小旗子标上，反映了他对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形势的关心。

一九四一年六月，希特勒法西斯匪徒开始武装侵犯苏联，苏联人民伟大的卫国战争开始了。

这时，战争破坏了苏联人民的和平生活，儿童院的经费缩减了，物资供应也日益困难。岸英他们每人每天只能领到一斤黑面包。在这严峻的日子里，岸英带领儿童院的孩子们上田野里种土豆、白菜、胡萝卜等蔬菜，收获之后，大部分上交，支援前线。德寇占领顿巴斯等重要产煤基地后，莫斯科的煤炭供应困难。为了解决燃料问题，在一九四一年大雪纷飞、寒风刺骨的严冬，岸英和他的伙伴们一起冒着零下二十度的严寒，在森林里搭起帐篷，伐木劈柴。由于没有暖气供应，到了晚上，他们便把毡靴、棉裤、棉衣、棉大衣全穿上，盖上被子，上面再盖上草垫子，可仍然冻得打哆嗦，很难入睡。艰苦的生活，繁重的劳动，没能使岸英他们屈服。在“一切为了前线”的口号鼓舞下，他们干劲十足，每人每天平均伐一立方米的木柴，除儿童院上课的教室烧一个壁炉外，大部分上交。在德寇快要侵犯到莫斯科城郊时，岸英他们被派到城郊挖反坦克壕。他们每人只有一根钢钎和一把铁锹的简陋工具，天寒地冻，钢钎扎下去如同扎在钢板上一样。但是他们从不叫苦，艰难地拿钢钎，一下一下地往下扎，然后再用铁锹把土铲开。在这艰苦的日子里，岸英始终走在前面，他早出工，先把工具准备好，同学们来了他就一一分配任务，收工后，他仍留在工地，挨个检查，并把零散的工具收拾好。在工作中，他注意做好宣传鼓动工作，使大家保持高昂的热情，因而较好地完成了任务。

希特勒法西斯匪徒给苏联人民带来的灾难和痛苦激起岸英满腔怒火。他纵观世界局势，到处狼烟蜂起，人类进步势力与法西斯势力正进行着生死存亡的大决斗。战争的现实使岸英认识到整个旧世界只有用枪杆子才能改造。为了反击德国法西斯的侵略，为了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指示，为献身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打下坚

实的基础,他不愿再在普通中学里呆下去了,迫切要求学军事,上前线。一九四二年秋的一天,苏联红军总政治部负责人来到依万诺沃市。岸英闻讯后,立即赶去找他,要求参军。经过一天的长谈,红军总政治部负责人为岸英的决心所感动,终于答应了他的要求。这样,二十岁的岸英很快就进入了舒亚的列宁军政学校学习。

在军事学校里,不论军事训练如何紧张、艰苦,岸英始终严格要求自己,毕业时成绩优异。由于在岸英身上凝聚着毛主席和杨开慧烈士培育他的心血,又经过国内外阶级斗争的严峻考验,再加上他刻苦学习马克思主义,不断改造思想,因而逐步地树立了无产阶级世界观。他积极要求入党。一九四三年一月,他被批准加入联共(布)党为候补党员。介绍人给他作的鉴定是:“学习好,劳动好,革命精神很饱满,树立了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志向,可以入党”。

岸英在列宁军政学校毕业后,旋即进入军政大学学习。这时他获得中尉军衔。一九四四年夏天,岸英在这里转为正式党员,不久,他终于来到炮火连天的战场,投身到苏联红军对德国法西斯匪帮的大反攻,作为坦克连的党代表,参加了解放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的战斗。

一九四四年底,苏联人民反对德国法西斯的战争快要结束,岸英从前线回到了莫斯科。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斯大林接见了,和他进行了亲切的谈话,表扬了他在红军中的贡献,并送给他一支手枪作为纪念。

岸英经历了苏联伟大的卫国战争,在行军和战斗中,目睹了德国法西斯匪徒的凶狠残暴,想到自己亲爱的祖国仍遭受日寇铁蹄的蹂躏,他迫切要求回国参加抗日战争。为此,他曾几次通过组织向党中央、毛主席请示,同时积极作好回国的准备。为了全面掌握马列主义基本理论,更好地为中国革命和建

设贡献力量,他于一九四五年进入莫斯科东方学学院学习。在这里,他着重钻研政治经济学,曾花了很大的精力阅读和研究被称为工人阶级“圣经”的《资本论》。这本书对岸英改造世界观和提高理论水平起了重要的作用。

### (五)上劳动大学

一九四六年一月初,岸英回国的要求获得批准,他很快就离开了苏联,回到延安。

从一九二七年和爸爸离别到现在已经过了十八个年头,这时岸英已经二十四岁了。他终于回到了爸爸的身边,心情无比激动。父子久别重逢,毛主席非常高兴。当看到岸英在飞机上得了感冒,毛主席立即拿了自己的毛衣给岸英穿上,岸英感到十分温暖和幸福。岸英深深知道毛主席不仅是自己的爸爸,更重要的他老人家是党的主席。于是,他下定决心,一定要按照他老人家的指示去做。岸英的思想和工作从此开始了崭新的一页。

岸英回国后,即由苏联共产党党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按毛主席、党中央的安排,他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一边协助翻译,一边学习政治理论、进修中文。在这里,他丝毫没有因为自己是主席的儿子而妄自尊大,也没有因为自己是留苏学生而显得特殊。在回国后不到几天,他就离开小食堂,和一般工作人员去大食堂就餐。当时,延安党政机关的干部,按级别和对革命的贡献,分别吃“小灶”、“中灶”、“大灶”。毛主席身边的参谋、秘书等大多吃“中灶”。他们建议岸英也吃“中灶”,可岸英不肯。他说:吃“小灶”“中灶”是照顾对革命有贡献的同志,我对革命还没有什么贡献,该吃“大灶”。岸英坚持吃“大灶”的行动,在延安的干部和家属中产生了很好的影响。

一九四六年三月的一天,晴空万里,太阳照得延安王家坪院子里暖洋洋的。附近山头和山沟里,青草初生,树吐新芽,一片生机盎

然。这一天，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岸英坐在院子里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平时，主席的工作一直很忙，岸英只有在陪伴主席散步时片断地讲了离别后的经过。今天，他详细地向主席汇报了离别十八年来自己的经历、思想、学习和生活情况，主席边听边提些问题。等岸英汇报完后，主席沉思了一下，说：你在苏联大学毕业了，还参加过苏联卫国战争，可是你还没有上过中国这个革命大学，你对中国的情况了解得很少，缺乏实践，这一课应当补上。理论只是知识的一半，你光有外国的书本知识还是不够的，还要把书本知识变成自己的才行哩！你还应当上上中国这个大学：到农村去拜农民为师，你可以学到在外国学不到的许多有益的东西。你说好不好呢？

岸英爽快地答道：“好，我也想到农村去，参加劳动，向群众学习，锻炼锻炼……”

主席接着指示岸英自带一斗半小米，一些菜种和行李，到模范村吴家枣园去学习劳动。毛主席又指着身边的参谋、警卫战士说：这些同志都参加革命好多年，你以后也要多向他们学习！毛主席又嘱咐岸英，到乡下去，要和农民一起住，一起吃，一起劳动。要锻炼得和农民一个样。

主席的指示象和煦的春风，吹得岸英心头暖烘烘的，他完全被即将开始的新的生活吸引住了。他激动得逢人便说：“我要上劳动大学去了！”

第二天，岸英脱掉皮鞋，穿上布底鞋，毛主席又将自己打过补丁的一套灰布衣服，给他穿上。收拾整齐，岸英按照父亲的指示，背上一斗半小米和行李，立即出发。这时，警卫员备了一匹马，要岸英把行李放在马上驮着走，岸英婉言谢绝了。他说：不行，这就是劳动的开端，锻炼就要从现在开始。

王家坪距吴家枣园有好几十里，岸英背着五六十斤重的东西，淌过延河，徒步走向

吴家枣园。陕北高原的三月，气候已经转暖，四处呈现蓬勃的生机。岸英从未背过这么重的东西，走这么远的路。他一边走，一边头上直掉汗。路没走一半，他已经是汗流浹背，气喘吁吁了。警卫战士几次劝他把东西放到马上，他都谢绝了，仍然一步一个脚印顽强地向前走去。到了吴家枣园，汗水已经湿透了他的衣衫。村长郝光发同志和一些老乡闻讯来到村头迎接，岸英连忙跑上去，紧紧握住村长的手说：“郝叔叔，爸爸叫我到您这儿学习来啦！”接着，岸英被安排住到吴满盈家里。因为路途的劳累，岸英放下行李坐在门坎上，当村子里前来欢迎他的人都走了以后，他便不知不觉地倚着门睡着了。几分钟后，房东家里的人发现他那解开衣衫露出的肩膀上，有道带子宽的肌肉肿起很高，心疼得不得了，非常钦佩岸英顽强的毅力。郝光发村长后来感动地说：“别说他从来没背过这么多东西，就是我们这些老把式，背这么重的东西走这么远，也要出几把老汗哩！”

第二天，岸英清早就随大伙一块下地了。郝光发村长为了照顾他，分配了几个老人和岸英一起刨地。他们有意地刨几下歇一歇，歇一歇刨几下。岸英却正儿巴经地向他们学习使锄头，一锄头一锄头地直往前刨。这样过了几天，岸英看到老是几个老人和自己一块不紧不慢地干，心里很纳闷，就问他们：村里其他人上哪儿去了？开始他们都不说，岸英一再追问，老人们说：“他们都上变工队了。那儿活儿重，你刚来，先跟我们一块干干，慢慢习惯了，再和大伙一块儿干去吧！”岸英听了，说：那不行，我要锻炼去。背起锄头大步流星地往山头上找变工队去了。

山头上，年轻力壮的变工队员正在开荒，十几把锄头飞舞，尘土飞扬。岸英上去，二话没说，甩开膀子就跟在变工队员后头干起来了。这个变工队是陕甘宁边区有名的模范队，和他们一起干活，对刚来农村劳动的岸英

来说，可是一次真正的锻炼啊！抡上七斤半的大镢头，干了大半天，岸英两手打满了血泡，血泡破了，殷红的鲜血把镢头把都染红了。旁边的人看了，心疼地对他说：“手痛得厉害吧？”岸英笑了笑，说：“不碍事。”他从口袋里拿出手巾，把手一裹，又干起来。旁边的人劝他歇歇，岸英恳切地说：“我年轻，需要好好磨炼。”就这样，他的手上几次打满了血泡，几次鲜血染红镢头把，但他从没有叫苦喊痛，而是咬紧牙关坚持劳动。到后来，他的手终于磨出了粗硬的老茧。刨地的时候，他也和其他变工队员一样，脱掉棉衣，甩去布鞋，满脸灰尘，满身大汗地干，有时太阳大，他就干脆脱掉上衣，光着膀子干。岸英走后，毛主席身边的警卫战士很想念他。在岸英离开王家坪半个月后，他们推出一名代表来看望岸英。这位同志到地头上一看，大家都光着膀子，干活一样的麻利，分不出那个是岸英了，他只得高声喊着岸英的名字。岸英听见了，笑嘻嘻地跑过来，亲热地和他打招呼。望着岸英黑里透红的面容，黝黑的膀子，这位同志感到十分惊讶。

刨完地后，已是四月初，春耕大忙季节到了。岸英起早睡晚地和大家一起起圈装粪，吆着毛驴送粪。春播开始，他学会了种洋芋，和大家一样脖子上挂着个布袋，一手抓粪，一手点种。他看到耕地赶不上进度，就争着学犁地。他不仅劳动积极，还向老农详细地询问麦子什么时候种，什么时候锄，什么时候收，洋芋怎么种，怎么施肥，怎么管理等问题，还把它记在随身所带的本子上。

在认真学习劳动的同时，岸英也注意抓紧自己世界观的改造。每天劳动之后，不管怎样劳累，晚上他总要伏在炕桌上认真学习马列和毛主席的著作，还写了读书笔记。晚上他睡得很晚，第二天一大早就起来给房东扫院子、担水、劈柴。他生活很俭朴，和老乡一起喝稀饭，啃窝窝头。他常利用晚饭后

的时间走家串户，了解群众生活，熟悉农村情况。他和贫苦农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村里大人小孩都很喜欢他。岸英就这样在毛主席指引下，在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金光大道上，迈出了可喜的矫健步伐。

一九四六年下半年，蒋介石指使胡宗南进攻延安，形势越来越紧张。岸英要学的各种农活也基本上学会了。郝光发村长和村干部一起商量，决定送岸英同志回去。村里的人听说岸英要走了，纷纷前来送行，把他住的院子都挤满了。他们打心眼里喜爱这个身穿粗布衣、头扎白羊肚毛巾、皮肤晒得黝黑的年青人。和老乡们告别后，岸英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吴家枣园，回到了毛主席身边。毛主席见了，高兴地说：白胖子变成黑胖子了。又看了看岸英结满老茧的双手，说：你学习的成绩不错嘛！不过，今后还得继续锻炼。

岸英回来后，继续在中宣部一边工作，一边学习。在这里他的学习抓得很紧，有时左手拿着馒头吃，右手拿毛笔练写大字。他积极参加打扫卫生、掏粪坑等劳动。当时延安正在修房子，岸英总是争着去扛木料，百十来斤的石头，他一个人背上就走，背和肩上都磨破了皮，出现一道道血痕，但他仍然坚持不懈。他和同志们相处得很融洽，和毛主席身边的参谋、警卫战士象亲兄弟一样，常在一块交谈。同志们给岸英讲述自己的战斗经历，讲苏区的武装斗争，讲二万五千里长征，讲八年抗日战争。岸英从他们身上汲取了丰富的政治营养，受到了很大教育。

一九四七年初，国民党反动派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被我粉碎后，仍然贼心不死，又抽调重兵向我山东和陕甘宁边区，实行“重点进攻”。三月初，战火逼近延安。这时，岸英同志一直在毛主席身边工作和战斗。三月十八日晚，他跟随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敬爱的周恩来副主席以及王震同志等一道，最后撤离延安，踏上了新的征途。

# 加法·减法·速度

周哲元

加减二法，本是人们最熟悉、最常用的运算法。然而，运用于实际，却也有被人们忽视之处，这就是，只注意算加法，不注意算减法，不大懂得二者之间的关系。

就拿农村的情况来说，很多同志，对于算加法，对怎样千方百计去增加产量、增加产值是很重视的，这无疑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对于减法，对怎样千方百计地减少开支，降低成本，有的却不那么注意。比如，有的大队、生产队，只知道用化肥，不注意大办农家肥，为了把化肥弄到手，到处拉关系，“开后门”，有时一百斤化肥甚至代价高达四、五十元也在所不惜；有的不珍惜劳动力，有些农活，本来十个人能够干得了，却偏偏要安排十多个甚至二十个人去干；有的种植无计划，一块地今天种黄花，明天改种柑桔，后天又要种麦子，翻来复去，花工不少，所得无几；有的搞一件事情，不是善始善终，尽可能搞一项，成一项，收一项，而是虎头蛇尾，如办集体猪场，花了很大工本去建猪栏，却不养猪，有的养了猪又不认真解决饲料生产、饲养技术等实际问题，结果，吃了很多饲料，猪却养不壮；有的不是想方设法使猪种、鱼种、菜种、禽种尽量自繁、自育，每年要花很多本钱购种子；有的队收回的实物东堆西放，鼠窃狗偷，工具财产也无专人管理，一年花去不少工具添置、修理费；有的开支无章程，甚至巧立名目，乱补助，乱吃喝。这样搞下去的结果，也许有的队增了一点产，但是成本很高，生产上去了，而把成本一“减”去，高速度不见了，这也是增产不能增收的一个重要原因。群众批评这叫“外面有棵摇钱树，屋里缺只聚宝盆”。而我们有些同志只醉心“加法”上赫然可观的“和”，而对“减法”里的“差”却不屑一顾。因此，对上述种种提高成本的行径（有的甚至是资本主义行径）就无动于衷，放任自流。

其实，不懂得算减法的人也不会真正懂得算加法。因为，加、减是互为依存、互为条件的一对矛盾，它们是紧密相连不可分割的。我们办任何事情都包含着加法，同时都包含着减法。在农业生产中，产量、产值是“加数”，但同时又是“被减数”，它是要“被”开支、成本这个“减数”去“减”的。而真正具有实在意义的，应当是产量、产值减去开支、成本所得的“差”。很明显，要使这个“差”数愈大，只有两条途径：一是使产量、产值愈大，二是使开支、成本愈少。当然，绝大多数社队干部是深明此理的，他们在发展生产的过程中，既注意增产，又注意节约，既算加法，又算减法，努力精打细算，讲究实效，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进，大家都应该向他们学习。

华主席、党中央号召我们要努力实现农业发展的高速度，我们一定要认真执行勤俭办社，勤俭办队的方针，千方百计地把产量、产值这个“加数”搞大，把开支、成本这个“减数”降低到最少限度，使农业发展的速度快些，更快些。

---

更正：本刊第四期第13页16行应为：枝柳、湘黔铁路动工修建之前。第18行第8字起应为：迅速建成通车，对山区建设起了重要作用。